

XIAOLU BEILUN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在学术界的研究，长期以来大都停留在定性描述和理论论证的层面，较少进行实证数据的经验研究。本书是一个可喜的例外。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与盈利能力普遍下降的事实冲突，形成了本书专门探讨的——效率悖论问题。

李利英◎著

ZHONGGUO GUOYOUQIYE DE XIAOLU BEILUN
JINGYANFENXI YU LILUNJIESHI

中国国有企业的 效率悖论：

经验分析与理论解释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 经验分析与理论解释

李利英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经验分析与理论解释 / 李利英著.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ISBN 7-5017-7726-8

I. 中… II. 李… III. 国有企业 - 企业管理:生产管理 - 研究 - 中国
IV. F27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7148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 www.bncf.com.cn

责任编辑:张晓楹

吴航斌(办公电话:010-68308644;约稿邮箱:hangbinwu@126.com)

责任印制:常毅

封面设计:白长江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开 本:A5

印 张:6.375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7-7726-8/F·6432

定 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59418 68319282



作者简介

李利英，女，1968年1月生，河南省南乐县人。1988年4月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就职于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2001年获天津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2004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副教授，曾获“河南省科技带头人”、“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主要致力于产业组织理论和转型经济领域的研究，尤其专注于国有企业效率水平和改制效果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曾参与或主持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有关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家级权威学术期刊。

ZHONGGUO GUOYOUQIYE DE XIAOLU BEILUN
JINGYANFENXI YU LILUNJIESHI

内 容 简 介

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但与此同时,盈利能力却普遍下降,这正是本书专门探讨的效率悖论问题。本书运用经验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检验了改革以后不同阶段的主要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效率和利润率的影响,发现:早期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效促进了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在促进利润率提高方面并未取得一致的效果。本书致力于解释这种结果,将主要改革措施对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认为产生效率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改革之下发生的。

序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学术界的研究，长期以来却大都停留在定性描述和理论论证的层面，较少进行实证数据的经验研究。因此，尽管从80年代后期，我们就开始并一直在进行国企改革的实证研究，但却很少被人重视，直到近几年来，人们才似乎意识到实证数据研究的重要性。经济学只是当它能够进行实证分析和科学检验的时候，它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否则，它或许只是某种特别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综合产物。

因此，当2001年我带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十分欣赏李利英对实证经验研究的选择，尽管这些研究当时还不太被重视，但是，李利英以她的直觉和执着刻苦，把这项庞大的数据分析研究工作最终完成，这本书就是凝结了她的心血的博士论文。

当然，对经验研究的重视绝对不是否认理论的重要性，我从来就是将理论和经验研究并行研究和发展的，没有一个好的理论，经验研究也就会缺少合理的基础和前提，会犹如大海捞针，或者作出一个没有意义的检验结果来。现在有些人对于技术和方法十分熟练，但是没有来自实践的合理理论抽象和敏锐的直觉，因而形不成有意义的理论假设，也就做不出有意义的经验分析的实证结果。所以，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先读理论文献，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一个透彻的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把握，然后再搜集有关现实素材和数据，形成好的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再次就是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去分

析和验证基本假设，最终得到分析结果。因此，一个科学的结论，正是建立在合理的理论抽象、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可靠的信息来源基础上的。这里，来不得一点虚假和偷懒。

我一直感叹，做好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易。一般的人文学科只需要阅读学习，不需要实证检验或试验，而一般理工科则主要在实验室做好试验就行，可经济学除了要掌握本学科的基础和专业理论外，还需要掌握数学、计量经济学或统计学，更重要的，还需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有着大量的感性认识和把握第一手信息素材，才能通过科学的检验形成合理可靠的研究成果。脱离了现实的经济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实验室实际上就是大社会，而且是一个很难驾驭的巨大的实验室。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比其他学科更多的心血、汗水和努力。

李利英这本书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然而在这里，我不想再讨论国企改革的是与非，而只是强调，对于国企改革的各种争议问题，需要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上，这样才能有科学的发言权和争论的合理平台。我也希望，今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能以这样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去对待，用科学方法去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这门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科。

李利英是我的博士生，她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成书了，值此写序的机会，借以勉励所有为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做出努力的莘莘学子。

刘小玄

2006年7月29日于北京

目 录

1. 导 言

- 1.1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效果评价：问题的提出 1
- 1.2 对效率悖论现象的现有解释 4
- 1.3 本书的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6

2.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效果评价：效率悖论

- 2.1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 12
- 2.2 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16
- 2.3 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动趋势 35
- 2.4 生产率与利润率的相关性分析：效率悖论 44

3. 国有企业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

- 3.1 导言 47
- 3.2 放权让利、竞争与生产率决定 55
- 3.3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生产率决定 65

4. 国有企业改革与利润率的决定

- 4.1 导言 86
- 4.2 竞争在利润率决定中的作用 89
- 4.3 放权让利与利润率决定 97
- 4.4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利润率的决定 103

5. 竞争、利益分配与效率悖论

5.1 生产率与利润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129

5.2 国有产权、过度竞争与效率悖论 133

5.3 利益分配格局与效率悖论 142

5.4 小结 171

6. 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6.1 经验分析：主要改革措施在效率悖论产生中的作用 173

6.2 理论解释：竞争、利益格局调整与效率悖论 176

6.3 政策含义：关于改革路径的讨论 180

参考文献

后 记

1. 导 言

1. 1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效果评价：问题的提出

如何评价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改革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效是学术界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成功与否。因此，对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效果的评价，成为引起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大量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力量被投入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

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这种渐进式改革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如陈宽等人发表了“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变动：1953-1985”的研究论文（Chen, et. al, 1988），发现改革前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改革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1978-1985年间增长率达4.8%-5.9%；Jefferson, Rawski, Zheng（1992）发现1980-1988年国有企业的TFP年均增长2.4%，集体企业年均增长4.63%；Li Wei（1997）的研究发现，1980-1989年样本企业的TFP年均增长4.68%。McMillan and Noughton（1992）及其相关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竞争强化而不是产权配置改变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中的关键作用。在企业的财务绩效方面，乐观派尽管也承认国有企业整体上表现出的不良的财务绩效，但他们认为不仅国有企业而且非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

也在不断下降 (Dic Lo, 1999), 并且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的财政补贴也在逐渐下降 (Jefferson, Rawski, 1995), 因此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并不是一种在本质上难以改革的产权制度形式, 在不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靠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的渐进式改革可以取得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

但悲观派则对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持消极态度, 他们认为, 第一, 中国的改革并没有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如 Woo et. al (1994) 认为 1984-1988 年间国有企业的 TFP 增长最多为 0, 在有些行业甚至有所下降; 第二, 即使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有所上升, 但其增长幅度低于非国有企业; 第三, 不仅国有企业在生产率方面表现欠佳, 用利润率、亏损面、亏损额等指标表示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也日益恶化。第四, 政府对国有企业不断提供的财政补贴占用并浪费了大量的财政资源, 并且国有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绩效已经成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恶化的根源。总之, 悲观派认为国有企业在生产率和财务绩效方面的不良表现是由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在本质上难以适应市场竞争引起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像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国有企业一样, 除了实行私有化, 不可能通过其他改革措施提高绩效 (Woo, et al. 1993; Sachs and Woo, 1994; Woo, 1997 等)。

正是这种激烈的争论激发了我们对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评价的极大兴趣。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究竟是否取得了成功, 争论的存在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仍然需要新的更为坚实的经验研究上的支持。如果能够对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主要效率指标的变化进行动态跟踪研究, 并对其表现给予经验上的验证和理论上的解释, 不仅在理论上能够丰富现有研究成果, 对悲观派和乐观派之间的争论提供新的经验依据, 而且对以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也将具有实践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对 769 家企业 20 年的追踪调查使这一研究设想得以付诸实施。这一调查随机选择了江苏、四川、山西和

吉林四省份的 769 家国有企业做样本，对其 1980 年 -1999 年的投入产出、财务状况及企业经营机制的变化等多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分三次进行，第一次是在 1990 年，得到了 769 家企业 1980-1989 年的数据，第二次在 1995 年进行，得到了 753 个有效样本，第三次调查在 2000 年进行，由于此时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破产、重组等已经开始出现，部分企业在此次调查中已不复存在，有效样本减少为 442 家。其调查时间之长，涵盖范围之广，样本量之大，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书所作实证分析主要以这一样本数据为主（后文中简称这套数据为 CASS 数据）。

但是，这一数据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一，由于调查分段进行，其间一些效率较低绩效较差的企业可能以破产或被兼并等形式退出，使后期数据主要是第三阶段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差。其二，这一调查的所有样本均属于国有企业，即使 90 年代中期以后有些企业进行了改制，但产权结构变化并不明显，这使这一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反映产权性质不同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难以比较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变动的差异。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运用统计年鉴数据和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观室所做的另一调查样本做补充，这一调查是 2000 年专门针对国有企业改制效果进行的，包括来自无锡、盐城、杭州、郑州和江门 5 个地区的 451 家企业样本，这些样本企业分布在纺织、机械、电子和化工四个行业，反映了样本企业 1994 年 -1999 年间的投入产出数据、财务指标和有关改制的具体情况（后文中简称这套数据为 CASS 改制数据）。

通过对 CASS 样本企业 1980 年 -1999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和财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我们发现改革以来的 20 年间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长期增长态势，其中大型企业生产率年均增长 4.2%，中小型企业年均增长分别为 5.1% 和 6.1%。并且尽管 90 年代与 80 年代相比较，90 年代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但依然保持增长势头，

并没有像有些研究(如 Jefferson, et al, 2000)认为的那样生产率出现下降趋势。这一结论似乎支持了乐观派对改革效果的判断。但样本企业的经济绩效却并不乐观,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同时,以利润率为主要指标的盈利能力却日益恶化,总资产利润率由 1980 年的 14.9 % 下降到 1999 年的 5.6 %,亏损面和亏损额也呈增加趋势。

样本企业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之间的不同表现,意味着我们不能单纯地用成功或失败评价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效,这一结论支持了首先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5)提出的我国国有企业中“效率悖论”现象的存在:中国企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同时,各项财务指标却持续下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没有在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企业的经济绩效相应提高,相反却出现了悖论现象?悖论现象的存在为我们理解中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本书正是以此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对改革以来主要改革措施对生产率和以利润率表示的盈利能力的影响的实证分析,最终发现“效率悖论”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从而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给予更客观的评价。

1. 2 对效率悖论现象的现有解释

我国国有企业表现出的“效率悖论”现象已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目前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竞争说。这种观点由 Naughton (1992) 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使非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本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生产领域,从而侵蚀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使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World Bank (1995) 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全要素生产率上升,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进入增强了市场竞争,使国有企业不得不改善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并且竞争也为政府评价和监控

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提供了信息。竞争对生产率的促进和利润率的侵蚀解释了国有企业“效率悖论”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但将竞争作为唯一的原因是不够的。因为一方面竞争不能解释为什么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低于非国有企业，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这种差距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竞争对利润率的侵蚀也并不必然导致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我国国有企业近 20 年来的利润率下降显然还有除竞争以外的其他原因。

第二，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侵蚀利润说。林毅夫等（1997）尽管没有用“效率悖论”这一表述，但也用生产率上升和利润率下降概括了改革的成效，他的分析仅侧重于解释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他们认为，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负担，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显性化。这种政策性负担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侵蚀了企业利润；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限制了竞争对国有企业的约束作用。李培林等（1999）直接根据其他人的研究得出“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悖论”的结论，他们通过对 508 家国有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国有企业在固定资产投入、人员使用和福利保险等方面承担的社会成本侵蚀了国有企业利润的结论。他们尽管客观地提出并描述了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现象，但他们的分析并没有发现同时导致生产率上升和利润率下降的原因，而仅仅是单方面讨论了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对利润的侵蚀作用，这也同样是不全面的。

第三，国有企业目标偏离说。Bai et. al（1997）从国有企业经营者追求的目标入手直接解释了为什么国有企业生产率上升却导致了利润率下降。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像私有企业那样唯一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在利润目标之外还追求产值的增长。他们用理论模型论证了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中如果产值的权重足够大时，生产率的上升不是促进利润率上升而是会导致利润率下

降。他们的分析用严谨的理论逻辑阐述了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一，但这种情况并不是改革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的始终表现，因为改革以后政府部门本身的目标取向从计划经济下的重产值向重利税转变，并且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渐实施和落实，国有企业的利润动机日渐加强（郑红亮，1992；马建堂，1992），但生产率和利润率的背离并没有随着国有企业利润动机的加强而减弱，而是表现为生产率不断上升和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因此用国有企业目标偏离解释“效率悖论”现象也有失偏颇。

第四，国有企业宏观定位说。刘元春（2001）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状况是由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和效率定位决定的。他们认为在渐进改革的过渡时期，国有企业具有稳定经济、控制社会稳定、提供各种福利和公共产品的宏观效率功能，为了实现这一功能，政府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投资、控制和协调。主要反映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的大规模投资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的这种宏观效率定位决定了其微观效率的恶化。因此，国有企业“效率悖论”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定位。诚然，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产权特性决定了其不得不承担一些宏观调控职能，但同时国有企业也因此而更有条件获得社会的稀缺资源，所以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职能并不必然导致企业微观绩效恶化。另外，用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投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似乎也有失偏颇。

1. 3 本书的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目标偏离说、宏观定位说和社会负担侵蚀利润说对“效率悖论”现象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侧重于从国有企业本身的特性着手，分析国有企业的目标或功能对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这些解释都是从静态意义上的解释，而“效率悖论”现

象是伴随国有企业改革出现的国有企业效率的长期动态趋势：生产率不断上升和利润率不断下降。自 1978 年始的 20 余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经历了不同的改革阶段，从最初的利润留成制、到承包制，又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税制；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同时期改革的侧重点不同，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也有很大差异。尽管国有企业的产权特性决定了其与私有企业不同的目标追求和宏观定位，但改革使不同时期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上的差异，必然会使国有企业行为在不同时期也会发生适应性变化，生产率和利润率的表现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原因。因此要解释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所表现出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的长期动态趋势，就必须从不同时期国有企业的不同改革措施入手，分析特定时期的改革措施在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决定中的作用，以从中发现“效率悖论”现象产生的制度原因。本书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首先实证检验不同时期各主要改革措施在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决定中的作用，然后再从理论上分析国有企业改革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利润率长期变动趋势的作用机制。

迄今为止，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引致的产品市场竞争日渐加剧，这种改革伴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过程；通过利润留成制、厂长负责制、利改税和承包制等调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即政府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这是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这种改革试图通过明晰产权和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形成国有企业各利益集团的权力制衡机制。为了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在“效率悖论”形成中的作用，本书将从这三个方面对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决定进行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竞争在“效率悖论”形成中的作用，本书将用非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占行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反映该行业产品市场竞争

程度的指标，在加入其他有关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用 CASS 样本数据检验整个样本期间竞争对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竞争加剧的确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 Naughton (1992) 和 World Bank (1995) 的结论，说明竞争的确在“效率悖论”的形成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具有一般性，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以来不仅国有企业而且非国有企业在生产率上升的同时利润率也在逐渐下降。

放权让利改革影响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利和利益格局，也必然会对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检验这种影响，本书将运用 CASS 数据中 1980-1993 年间的样本数据，重点考察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产量决策权、投资自主权和资产处置权等经营自主权的获得和人均留利、浮动工资比例等企业内部激励措施的实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产量决策权和投资自主权的下放对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但用工权和资产处置权对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人均留利和浮动工资比例对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利润率而言，除投资权对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外，其余的自主权变量都与利润率负相关，而人均留利和浮动工资比重与利润率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经营权力的下放是 90 年代中期以前“效率悖论”现象产生的又一推动作用。

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在 90 年代国有企业呈现出的形成中的作用如何，也将是本书的研究重点。CASS 改制数据为本书对改制效果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这一样本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改制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尤其是明晰股权的改制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更为明显，相反，改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如果对改制过程中产权结构的变化与改制效果做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伴随着国有资本退出和个人资本与外商资本进入的改制对利润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经营者的产权比